

王友胜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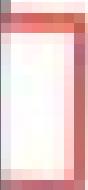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历史·文化



王友胜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 王友胜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325—3830—3

I. 中...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文集 IV. I206.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968 号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王友胜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责任编辑 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400,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830—3

I · 1732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前　　言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中文系最主要的学科之一,该学科创建于 80 年代初期,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建设,现已取得了显著成绩。1992 年成立了古文献研究室;以古代文学学科为主要依托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1995 年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级重点建设专业;1997 年该学科开始与湘潭大学联合招收硕士研究生,2001 年 1 月经湖南省学位办批准,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 2002 年 9 月首次招收研究生;同年 6 月被评为原湘潭师范学院“十五”规划重点建设学科;2003 年 1 月经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委员会专家评审,被评为湖南省“十五”重点建设学科。2003 年 4 月,原湘潭师范学院与原湘潭工学院合并组建湖南科技大学后,学校为加强学科建设,又评审通过了五个 A 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也是其中之一。

该学科现拥有教授 6 名,副教授 7 名,讲师 4 名,具有博士学位者 4 人(另有在读博士 2 人)。近五年来共完成了 17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目前,该学科在研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5 项,其中包括 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 项高等院校古委会项目。该学科点近五年来共出版各类著作 19 部,发表论文 210 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0 项,其中含国家图书奖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奖 1 项,新闻出版署古籍整理优秀图书

奖二等奖 1 项,省政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优秀奖 1 项。

该学科经过多年建设,现已形成三个比较稳定、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先唐文学与文化学、唐宋文学与文献学、元明清诗文与湖湘文学。唐宋文学与文献学研究方向在该学科中最有成就,具有领先地位和带头作用。尤其在唐诗文献,唐代文馆、交通与文学,唐宋诗学的文化转型,宋诗学等四个学术领域中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向最突出的特色是崇尚实证,不务空谈,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并重。在研究内容上,既注重面的拓展,又强调点的创新。

先唐文学与文化学研究方向一则侧重于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遗产作语言学、心理学、民俗学、文艺美学及文学人类学等多视角的解读与阐释;再则重点研究宋玉辞赋;三则注重魏晋六朝佛教与文学研究。该方向的显著特色是强调学科渗透,学科交叉,并由此带来一些新的知识增长点,如民族、服饰、舞蹈与文学,宋玉辞赋传播接受历程研究等。

元明清诗文与湖湘文学研究方向侧重于元明清湖湘作家诗文研究,明清诗文理论批评研究,戏剧理论与地方剧种研究,另对明清小说也间有研究。其显著特色,一是重视个案研究,对明清时期重要湖湘作家展开深入具体研究,以点带面,剖析源流;二是突出湖湘地域特色,剖析其文学地域性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共通性。

为了展示本学科的群体科研成果,也为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得到同行专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编选了这本论文集,选录共 16 位教师的 39 篇论文,这些文章中除 1 篇刚成文外,其他均在全国各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过。收录标准主要以能反映作

者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水平为主,兼顾各阶段与文体的平衡。作者中既有成果卓著的资深老教授,有年富力强、在学界已崭露头角的新锐,也有刚刚迈进学术园地的青年教师,为了学科的梯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我们适当收录了后者的论文。囿于篇幅,有些学者还有不少质量较高,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未能入选,颇有遗珠之憾。

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湖南省“十五”规划重点建设学科与湖南科技大学 A 类重点学科的资助,上海古籍出版社给予热情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论文集中的文章难免有疏漏与错误,我们诚恳地请求专家学者提出批评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努力搞好科研,使本学科的整体科研水平更上一层楼。

王友胜

2004 年 2 月 1 日

目 录

前 言	王友胜	1
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	李德辉	1
从意境说和典型说看中西艺术美学的差异	夏昭炎	11
神思、想象和“神与物游”——兼论传统艺术		
思维的特征及中西艺术思维之异同	夏昭炎	25
“笔记小说”与笔记文学研究	陶 敏 刘再华	38
试论苗族远祖传说对“盘古”神话的影响		
.....	杨昌国 胡晓东	56
苗族神话和汉族神话体现的生命形态	杨昌国	65
先秦寓言中愚人形象分类及宋人居多的原因	汤力伟	71
屈原“放逐”说质疑	郭瑞林	79
二十世纪宋玉研究述评	吴广平	92
宋玉著述辨	吴广平	110
《全汉赋》辑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广平	120
曹植女性题材作品前后期之比较	汤力伟	144
论萧绎崇儒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背离	艾初玲	151
《景龙文馆记》考	陶 敏	161

李白的咏史诗及其审美价值	王友胜	187
杜诗“诗史”说略评	李一飞	200
韩愈白居易文学交游考	邓新跃	209
中唐传记文学鸟瞰	李一飞	218
中唐诗风的新变与元和体的形成	邓新跃	237
《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	陶 敏	248
怨与恋的回归意识——对唐宋间的望京楼		
及望京楼诗文的文化透视	李德辉	263
词中的别一个范仲淹	萧廷恕	287
梅尧臣早期事迹考	李一飞	299
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	王友胜	316
清人编撰的三部宋诗总集述评	王友胜	338
东坡不满淮海词辨	萧廷恕	355
试论南宋词人韩元吉及其词	李德辉	366
试论明清悼亡诗词的艺术特色	林彬晖	377
明初闽中诗派与高棅的《唐诗品汇》	邓新跃	392
论船山诗学思想的得失	郭瑞林	416
魏源的时事诗刍论	郭瑞林	438
“逼”下梁山——对宋江走上“招安”之路的		
新思考	张晚林	451
施耐庵: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论潘金莲形象的深层意蕴	张晚林	463
情礼调和 皆大欢喜——从社会文化思潮看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团圆结局	李鸿渊	476

目 录

晋城南石店虫王庙舞楼看楼碑刻考述.....	李跃忠	489
泽州秧歌的形成及发展历史.....	李跃忠	499
明代湖南戏剧创作浅论.....	刘奇玉 李建武	528
杨恩寿的戏剧理论体系探析.....	刘奇玉	540
论汤显祖谪居徐闻所倡“贵生说”	李鸿渊	554

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

李德辉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一种形式独特、内容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文学作品系列,这就是行记。然而,长期以来文学研究者对这个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却不太了解,不甚重视。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都置大部分行记于不顾,认为行记属于地理范畴,目光拘囿于《入蜀记》等少数几部名作。由于对行记的起源、流变、文体特征缺乏认识,又把《来南录》、《吴船录》等行记说成是游记,人云亦云,混淆了两者的区别,模糊了两者的各自特点,笔者认为不能不辨。

—

自唐以来,行记的主要研究者一直是治历史、治舆地者。清代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认为,像《法显传》、《中天竺国行记》等作品都是“词章家之地学书”,虽然部分内容带有文学意味,但实质上仍是地理书。要回答行记究竟是地理书还是文学作品这样的问题,就必须追溯它的起源与流变,深入研究它的文体特征。全面仔细地考察行记的起源与流变后就会发现,行记属于

文学作品,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行记之名,最初出现于《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其中,《魏聘使行记》、《封君义行记》、《序行记》、《李谐行记》是首批直接以“行记”命名的作品,但它们都产生于刘宋、齐梁间,此前,行记还有更为古远的源头。真正能揭示行记性质,看出其渊源所自的是产生于两晋的第一批行记。这批主要由僧人撰写的行记,本来又称“行传”,如《法显传》又名《法显行传》或《佛国记》,北魏僧人慧生所撰的行记亦名《慧生行传》。有的直接以“传”名篇,如昙景《外国传》、法盛《历国传》、智猛《游行外国传》。又有传、记并称者,如昙无竭《历国传记》、宝云《外国传记》。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这些作品都是僧人私撰的旅行记,与正史外国传有本质的区别。其最初名称曰行传,即表明是关于人物旅行活动的传记。从今天仍比较完整的《法显传》、《宋云行记》所载可知,二书均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行踪为线索,按时间顺序连续叙述人物西行行程,而当时的正史人物传也是叙述人物一生行实的,二者性质接近,故名之曰传。客观地看,无论行记的形式如何多样,内容怎样复杂,始终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而不像地理书那样只是客观地介绍地理名物。行记虽大量涉及舆地,却是靠叙事手段串联起来的,是结合叙行程这一中心而顺便交代的,这就有别于静态的第三人称式的介绍。而且从形式上看,行记具有叙事作品所要求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等六要素。唯一不同的是,行记没有叙事作品特有的情节与矛盾冲突,但这并不影响其性质,因为从本质上讲,二者仍不无相近之处:行记中的行踪或路线相当于小说的情节线索,有了路线,琐碎的小事被系统化了,被赋予了意义。像《法显传》、《大唐西域

记》、《南行记》、《来南录》、《揽辔录》、《吴船录》虽看似文笔散漫,前后关联不紧,但都以旅程为线索,使看似芜杂的题材能够自然地回归主题,旅行一旦终止,作品也随之收束。在这类作品中,奥地的内容只是人物活动的伴随物,与纯粹的地理书是不同的。

行记的行传性质还可以从古典目录学上得到证明。行记在宋代达到了高度繁荣,并且反映到了当时的目录学上。宋代不少目录学家都看到了行记的行传性质,因而将唐宋人所撰的部分行记著录在史部传记类和子部小说家类,如范成大的《吴船录》、《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都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路振《乘轺录》、富弼《奉使别录》、楼钥《北行日录》、刘涣《刘氏西行录》,均见于《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李德裕《南行录》等7种唐宋行记,均见于《崇文总目》卷二传记类。《宋史·艺文志二》史部传记类著录了王仁裕《入洛记》、《南行记》和范成大《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等30余种宋人行记,《文献通考》史部传记类亦载有10余种宋代行记。综合上述,大部分唐宋行记都在其中,说明古人对行记的文体特征与行传性质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第二,行记采用了叙事文学作品的常见手段。它一般以自传语气出现,以第一人称叙事,既有很强的时代性,又高度个性化。虽然内容容易被人忽视、遗忘,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与社会景观、自然景观的关系。作品常常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自己的见闻,读起来具体、真切。比如晋法显《佛国记》、唐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宋张舜民《郴行录》,就把自己西游天竺、西使吐蕃、出贬郴州的全过程,讲述给读者,娓娓道来,如在目前。作者的深沉感触沉淀于字里行间,其真切、感人的效果是任何史

部地理书、四夷外国传乃至很多人物传记都无法比拟、无法达到的。叙至感人之处，作者常情不自禁，情绪在客观叙述中自然流露出来。如《法显传》：“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南，到罗夷国。”情真境真，千载而下读之，仍不免悄然动容。宋代国力贫弱，每年都派遣官员使金，使金的文人如范成大《揽辔录》、楼钥《北行日录》就充满了屈辱感与痛苦感，都描写到金人统治下的北方沦陷区人民“忍死望恢复”，虽陷敌几十年而子孙始终不肯忘宋服，每至宋使经过，夹道迎送，有时失声痛哭，悲不自胜。使至汴京，见楼观岿然，天街肃穆，未尝不泫然出涕。又叙述路过汴河，见其因久不通航而淤成衢路，民皆种麦于古河道上，或有车马奔驰其中，泗水以北，地皆荒瘠，金人时时游猎其间，而获獐兔，宋词中“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遣人惊”的场面，不时可见。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深重的忧患意识，提升了作品的境界，其中还夹杂着对国事的理性思索与对一味求和苟安之国策的冷峻批判，所有这些，都是文学性的突出表现。

第三，行记的语言是富有特色的文学语言。悟空《入竺记》率真质朴，玄奘《大唐西域记》宏丽奥博，胡峤《陷虏记》深沉凝重，范成大《吴船录》平易晓畅，李翱《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和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古雅严谨，有似史笔……这些都表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学风格。上述诸家，除了僧人不长于文学外，其余各家，或老于文章，谙熟章句，如李翱、范成大；或久掌史任，文笔老到，如欧阳修、王安石，其语言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认行记是旅行者撰写的叙述旅行经

见的叙事散文，具有叙事文学性质，考察其学术渊源，最初一批行记产生于晋宋时期的西行求法运动。当时佛法正深入渗透中华文化，民间有着普遍的宗教热忱，欲亲赴异域亡身求法者甚众，佛教自身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于是奔赴西域巡礼求法者日多，大批僧人行传应运而生。当时的晋宋史学界，则流行为高僧作传以弘扬佛法，产生了很多僧传。另外，正史之外的私家撰述风气也颇盛。在体裁运用上，纪传体逐渐压倒了编年体，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体式，18家《晋书》中，仅有6家用编年体，东汉、三国史也是如此。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传记体文学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先贤传、耆旧传、高士传、名僧传、家传、外传，品类繁多，行传即其中的一种。诸种传记，体裁都取法于《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几家，学习其纪传体的人物传记撰述方法，同时也借鉴了编年体排比日月，年经事纬的叙事方式，带有明显的史传特征，只是随着经典作品的出现和行记的文体的不断演变，写法越来越靠近文学作品，而自异于其他史传了。

二

我国行记发展到宋末元初，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完全成熟，因此南宋郑樵得以在其《通志·艺文略四》中就此作出总结。郑氏将史部地理书分为十个小类，十类之中，行记居其三。郑氏根据行役地点与性质的不同，将行记区分为朝聘、行役、蛮夷三类。朝聘以刘师知《聘游记》为代表，行役以《李谐行记》为代表，蛮夷以《佛国记》为代表。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沿之，略有增补。郑氏的分类基本上是可取的，这一分类表明唐宋以

来行记三体分立的格局已基本奠定。此三类各具特色，影响深远。元、明、清众多行记，皆为此三体所规模。经宋、元、明、清人的不断努力与完善，行记已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表达方式与结构方式，其内容、形式、风格各具机杼。这些独特性，是行记区别于其他体裁样式文史作品的基本特征。

在时、地、人、事四个叙事要素中，行记特别重视对时间、地点的交代，以时间、地点为标志来交代行踪。行记的着重点本在于记“行”，以“行”为叙述对象和基本内容。这种“行”有其质的规定性，往往特指负有使命与目的的“行”。如西行到中亚、天竺是为了巡礼求法，出使吐蕃、回纥是为了完成外交使命。这就使得行记与游记所记的山水游赏有着着眼点、侧重点的不同。明确的目的性，强烈的使命感必然会影响到作品的内容、风格。如南宋人使金、使蒙元，自然更多注意金与蒙古的城郭人民、历史遗存、社会风尚等社会文化内容，而不会多留意山水审美。行记之“行”的另一个具体内涵是特指长途旅行，如西行记所述，距离最近的也在西域的高昌国，大多数在中亚、天竺，有的甚至远至地中海，往返时间长，路途遥远。如法显用去 14 年，宋云 6 年，慧生 9 年，玄奘 17 年，悟空 40 年。行役记与交聘记所述行役，往往横跨纵越中国内地南北东西，里程动辄几千里。如李翱《来南录》叙长安至岭南广州的水陆交通，8000 里途，耗时 6 月有余。刘元鼎入吐蕃逻些城会盟，历时 8 个月。陆游自绍兴至夔州，范成大自成都至临安，分撰《入蜀记》、《吴船录》，其吴蜀航程，亦是动经六七月，江行几千里，都不同于一州一地、三日二日之游，这种区别在古人那儿是很清楚的。

一般地说，行记交代时间、地点、行踪，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不标明具体日期，而以行程为单位，概括地将从甲地

至乙地一段时间内的经历记载下来，中间的内容则采用笔记的记事方法，一条一条地记载，看似内容松散，前后关联不紧，实则为行程所统属，学者称这种概括体式为笔记体。这种体式宋以前占主流。如《法显传》：“（从沙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宋云行记》：“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这种方式简要实用，浓缩了许多信息，只述主要经历，略去枝节，适合于性格恬淡、不尚详赡、文学修养不高的人，晋唐间很多僧俗名气不彰，地位低微，但都有宗教热忱，运用此种方式撰写行记的，恰恰是他们。

另一种是标明日期，逐日记事或择日记事，通常称为日记体。盛唐时，圆照《唐大和上东征传》即开始标明日期，但时有时无，并不规范。中唐李翱《来南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则建立了标准的日记体记事方式。李翱曾任史官，史笔精熟，他创造性地将编写实录的编年体方法运用到行记撰写上来，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逐条排比，连贯而下。如《来南录》：“辛丑，及河阴。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医察脉，使人人卢。又二月丁未朔，宿陈留。”宋欧阳修《于役志》、王安石《鄞县经游记》亦采用此种体式。圆仁《入唐记》、圆真《行历抄》则不标干支，直接写明日月次第，事无巨细，一一载明，虽嫌繁芜，但保留了许多当时事件的细节，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与具体性。《入唐记》记述唐武宗残忍好杀，毁佛佞道，筑坛迎仙，其愚妄无知的形象跃然纸上。还有许多佛教与社会发展的资料，都为他书所无，弥足珍贵。宋楼钥《北行日录》、张舜民《郴行录》、程卓《使金录》、范成大《揽辔录》都是日记体。自此以后，日记体名